
July 2015

Between Language and Time: Yale School's Theoretical Generation and Its Location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Dengyun Da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Dai, Dengyun. 2015. "Between Language and Time: Yale School's Theoretical Generation and Its Location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4): pp.130-13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4/6>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在语言与时间之间

——耶鲁学派的理论生成及思想史位置

戴登云

摘要:“耶鲁学派”诗学的原创性贡献在于: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在反叛新批评、吸纳欧陆思潮的过程中,将研究的重心从文学批评的“科学性”、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和文学史的“事实性”转移到了文学批评、文学文本和文学史的“生成性”之上,从而成功地开创了一种新的诗学研究范式“生成诗学”。“耶鲁学派”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时间哲学转向”的背景下,耶鲁文论家们凭着自身对文学语言和文学时间的错综复杂性的独特敏感,打破了西方文论和西方哲学单维度的思维定势,对语言的多维度和时间的多向度的本体属性作出了全方位的直观和领会,从而为自身的研究找到了新的理论基点。

关键词: 耶鲁学派; 语言; 时间; 理论生成; 思想史;

作者简介:戴登云,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诗学、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本文为“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团队名称: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团队编号:13TD0059)”,以及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一级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15XWD-S0501]阶段性成果之一。电子邮箱:ddy2791@126.com

Title: Between Language and Time: Yale School's Theoretical Generation and Its Location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Abstract: The Yale School constructed a new mode of poetics research through its departure from the New Criticism and imbibitions of Continental thought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poetics lies in its generative poetics that shifts the focus of literary studies from the scientificity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literariness of literary texts and the factualness of literary history to the gener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text and literary history. The fundamental reason behind the Yale School's achievement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Yale School theorists, under the context of linguistic turn and time philosophy turn i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with their distinctive sensitivity to the complexity of literary language and literary time, found a theoretical departure point in the one-dimensional thinking stereotype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philosophy by taking an ontological perception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literary language and the multi-orientational nature of time.

Keywords: The Yale School; language; time; theoretical generation; intellectual history

Author: Dai Dengyu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outhwest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 in Western poetics a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Email: ddy2791@126.com

一、语言与时间问题的首要性

在《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1935年)一文中,海德格尔劈头就写道“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

无反倒不在?这是问题所在。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个普普通通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显然这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海德格尔 3)。

之所以要引用海德格尔的这段文字,乃是因

为,在这里,我将“摹仿”海德格尔说^①——用耶鲁学派文论家的术语来讲,更准确些,乃是我将以“重复”(希利斯·米勒)海德格尔的言说方式的方式,以“修正”(哈罗德·布鲁姆)海德格尔的问题意识:

究竟为什么语言和时间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是问题所在。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个普普通通的问题。“究竟为什么语言和时间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显然这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

长期以来,文论界早已习惯了将“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或“文学的审美自主性—政治功利性的二元对立”视为是文论研究的“首要问题”。因此,当听到“究竟为什么语言和时间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才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这样的说法时,肯定会感到诧异。同样地,对于习惯了将哲学等同于哲学史(哲学经典的阐释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或“自识与反思”的传统哲学界来讲,或者对于习惯了各种视角主义的、反基础主义的后现代哲学家来说,听到“究竟为什么语言和时间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才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这样的说法,也一定会感到惊奇。究竟为什么语言和时间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才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呢?

从经验上讲,我们一开口说话,就可能遭遇“可说/不可说”的窘境。而从生命的成长历程来看,从我们获得最初的自我意识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永远”地遭遇了“生/死”、“永恒/非永恒”的时间性困惑或难题。然而,经验的直接性与时间序列上的优先性并不足以保证“究竟为什么语言和时间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一问题的首要性。“究竟为什么语言和时间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才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若继续以一种海德格尔式的腔调来说,个中原因,就在于:首先,它是最本源的问题;其次,它也是最深刻的问题;最后,它还是最广泛的问题。

首先,语言和时间的复杂交织是最本源的问题。追问本源是人类思想的天命。然而,倘若我们将“本源”视为是外在于追问者的一个时间序列上的最原初的点,那么,我们马上就会遭遇“第一性问题与第二性问题的断裂”的悖论:假如“本源”是先存的、第一性的,不仅对本源的追问本身必将沦为后天的、第二性的,也就是永远丧失其本源性,本源也会在追溯的过程中无穷后退。对

本源的追问也就变得不再可能。

然而,假若“本源”真的“存在”,那么,它究竟应该存在在哪里呢?一方面,由于离开了“本源”的“追问者”和对“本源”的“追问”,“本源”问题将不可能得以提出,更不可能得以成立,也就是说,“本源”存在与否根本毫无意义;另一方面,离开了对“本源”的发问,换言之,假若缺乏了“本源性”的思,人类思想又必将丧失其根基。因此,所谓“本源”,就必然存在在——也只能存在在“本源”的追问者在对“本源”的原初追问中所触发的原初境域中。用现象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存在于其“意向性”关系所规定的存在境域中。^②除此之外,不可能还存在在什么别的“哪里”。

然而,在这一“意向性”关系所规定的存在境域中,“本源”和“本源问题”究竟如何得以现形、得以存身,并迫使追问者向之发问呢?在本源的意义,惟有借助于语言、惟有依凭于语言、惟有通过语言。然而,由于从来就没有能离得开“时间”的“语言”或“言说”,而“时间”也是一种“语言”,“时间”也在“时间”自身之中“言说”自身。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必然要修正为:惟有借助于语言和时间、惟有依凭于语言和时间、惟有通过语言和时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和时间原初交织成了“本源”和“本源问题”的中介、通道和其本身(自身)。

语言和时间原初交织的本源性决定了这个问题的深刻性。内在于语言的本性,语言只能以“可说/不可说”的悖论姿态向我们展现它自身。内在于时间的本性,时间只能以“永恒/非永恒”的难题论状况向我们显形,或敞现它自己。由于语言和时间原初交织的本源性,使得语言的“可说/不可说”的悖论和时间的“永恒/非永恒”难题必然加诸对“究竟为什么语言和时间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追问”本身,由此决定了此问题必将触及“本源”问题的无底深渊,最终抵达人类思想史最困难最深刻的时刻。

最后,语言和时间原初交织的首要性还在于它的广泛性。在本体的意义上,不仅所有的人造物(包括技术、制度、文化和观念等等)和自然物在语言和时间面前无所遁形,就连那不可言说的“无”、无法触及的“永恒”以及这“不可言说”本身,也将藉语言和时间隐匿和显现自身。由此决定了这个问题的无边无界、笼罩一切。

所有这些属性叠加在一起,不仅使“语言和时间的复杂交织”成了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而且使“语言和时间究竟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语言和时间的复杂交织究竟有何意义?”这样一些问题成了困扰人类思想史的永恒之谜。

二、在通往语言和时间的复杂交织的途中

如果上述论断是成立的,很有可能,它将产生如下两个方面的效应:一、为我们重新审视当代哲学和文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向确立新的参照坐标;二、为我们重新审视中西方思想史提供一种宏阔的比较思想史视野。为什么?自人类思想史诞生以来,中西方思想家不是早就深入探讨过“语言”和“时间”问题了吗?现代思潮兴起以后,“语言”和“时间”问题更是成了西方思想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为何还要说“语言与时间的复杂交织”这一问题乃是一“全新”的、“首要”的问题呢?为何对这个问题的谈论必然要引发对中西方思想史和思想的历史性、思想的必然命运的重新追问?

且让我们继续以海德格尔为参照点,来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简要讨论。

如所周知,终其一生,海德格尔的哲学运思都以化解“存在者之存在”和“作为存在的存在”(存在本身)的“存在论差异”——亦即“第二性问题与第一性问题的断裂悖论”为目的。为此,海氏不仅对“时间性的此在”作出了卓越的领悟,对“存在—语言—道说”本身也给出了超越性的沉思。然而,海德格尔是否成功地破解了“存在论的差异”并如其所示地把握住了“语言”和“时间”的复杂交织呢?

鉴于学界对早期海德格尔“通过时间性的此在来追问在”的运思道路所带来的困难^③已有透彻的了解,这里,我们只重点分析一下后期海德格尔“通过在的追问来建立此在”的思路转向所带来的启示。

表面上,通过“存在—语言”自身“道说”自身的思路转换,通过对“道说”自身的“召唤—聚集”、“澄明—隐蔽”的“二重性”或“原始的分”机制的精巧“暗示”,后期海德格尔成功地消弭了困扰着他的“存在论差异”。然而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且让我们来看一看他前后期思想转换的一个

关键环节。

在《形而上学导论》(1935年)一书中,海德格尔指出,如果要按照“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的本来意义来追问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摒弃所有任何特殊的、个别的在者的优越地位”,包括追问这个问题的人在内(海德格尔 5-6)。这里所谓本来意义,按海德格尔的意思,即指该问题所牵涉的乃是“在者整体”、存在本身。而与此“本来意义”相对应的追问方式,就是“从被询问的与向之询问的东西那里生发出一种向着问题自身的反冲”(海德格尔 7),即在者整体“自身向自身的提问”发问。

表面上看,在这里,海德格尔不仅严格地遵循了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和精神,甚至比胡塞尔还原得还要更彻底、更超越。然而事实上,二者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一差异即:从对所有任何特殊的、个别的在者的优越地位的“摒弃”到对“在者整体”的确认,海德格尔的“还原”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快捷,以致省却了所有“对在的追问究竟何以可能”等诸多现象学还原的“程序”。

海德格尔并没有严格地践履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方法,更别说穷尽了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全部丰富的可能性(尽管海德格尔很想做到这一点)^④。海德格尔对所有任何特殊的、个别的在者(包括人在内)的优越地位的彻底放逐和贬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彻底斩断了“此在”这一扩大了“个体”与“存在”本身的“意向性”关系。

然而,此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限定,对“语言”的道说,全都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的。由此可以断言,后期海德格尔“通过在的追问来建立此在”的思路,实际上仍是建立在前期从“时间性的此在”到“存在”本身的“致命一跃”的基础之上的。只不过,通过其半诗性的独特言说,后期海德格尔巧妙地隐藏了这一基底。^⑤

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讲,海德格尔对全部存在的本质的追问,就依然是建立在第一性和第二性的断裂之上的。海德格尔试图通过批判西方哲学和神学对存在的遗忘而返回到古希腊哲学的伟大开端、返回到存在的原初起源的努力,就并没有实现他预期的目的。海德格尔尚未抵达人类思想的原初境域。

然而,海德格尔毕竟如此卓有成效地批判了古希腊已降的整个西方哲学和神学。因此,究竟

是什么原因使然,使得他也未能化解“存在论差异”之间的矛盾呢?

且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所具有的特征。

海德格尔认为,古希腊哲学自开端之后就终结了。从此,存在就被西方哲学和神学所遮蔽和遗忘。^⑥从表面上看,西方哲学对存在的遗忘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即从相型(Idea)→范畴→在场→实体→理念→……→纯粹主观化的思。而实际上,这种遗忘具有某种一以贯之的根本性特征。这一根本性特征即:将无所不在的在降解为一种对象化的实体、一种现成的物、一种可无限分析、分解的东西。

不只是遗忘了存在,根据海德格尔,由于“存在-时间”(海德格尔早期)、“存在-语言”(海德格尔后期)的一体性,因此,遗忘了存在,就等于是遗忘了时间和语言本身。

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为什么会遗忘存在,进而遗忘时间和语言本身呢?稍作分析,我们便不难发现其中原因。这一原因即“对永恒真理或确定性的伟大诉求和渴望”这一“哲学”的诉求或动机本身。基于这一渴望和诉求,整个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世界的终极实在、宇宙的绝对的原初起源的确定性、超越性和永恒性。这样,尚未实现的、有待追求的终极目标便成了追问的前提,成了某种现成之物。所谓“存在论的差异”便不再成为问题(或被虚假地裁决),语言和时间也失去了其本体论的地位。时间被抽空、驱除为永恒,语言沦为工具。最终,对时间和语言的本体属性的遗忘,就成了必然的结局。

回过头来看海德格尔,他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否抵达了这个层次呢?显然,尽管海德格尔质疑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但他却从未质疑过哲学本身。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同样分享形而上学的共同动机:渴望追求伟大的确定性或永恒真理。纵观海德格尔的前后期著作,“哲学的一切根本性问题必定都是不合时宜的”,“哲学本质上是超时间的”(海德格尔 10)这样的宣示可谓俯拾即是。

然而海德格尔毕竟以一种半诗性的独特语言揭示了西方思想的必然命运“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讲,在用西方形而上学的语言来反形而上学的努力过程中,现代西方思

想似乎已遭遇了某种言说的有效性的极限性边界。现代西方思想重新陷入了某种“可说/不可说”的窘境。^⑦

在通向语言和时间的复杂交织的途中,当代西方思想已遭遇了用西方形而上学的语言来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的极限边界。假若这一事实属实,这自然会令人联想起:这一事实本身是否昭示了某种东方思想的可能呢?

如所周知,由于古典中国思想始终把世界的终极实在、宇宙的绝对的原初起源视为是与它的追问者及追问本身紧密“相关”的发生着的“道”,因此,对原初发生的几微处所触发的非对象化的全部存在境域的重视,就成了中国古典思想的根本特征之一。为抵达、持守这一原初发生的几微处所触发的非对象化的全部存在境域,中国古典思想竭尽所能地摆脱了“语言”和“时间”对自身所造成的束缚,在最高的层面,亦即在道之原初发生的层面,对语言和时间本身作出了最卓越的领会“正言若反”(老子《道德经》)、“大时不齐”(《礼记·学记》)等等。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对“语言和时间”难题的优先考量,就成了古典中国思想最隐秘的基底之一。^⑧

然而,思想史的奇特命运在于,经过众多现代西方思想家的不断“反抗”和“修正”,当现代西方哲学明白无误地将语言和时间的复杂交织问题重新摆上本源的位置时,现代中国思想的主流取向,却是向着西方形而上学“逆转”,去追求某种对象化的实体、客观存在的真理和实证化技术化的知。

由此可见,在通往语言和时间的复杂交织的途中,从来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许,人类思想根本就逃不脱不断地破解它又不断地自我拆解的悲剧命运。

三、耶鲁学派诗学的语言—时间之思

幸运的是,对于困扰人类思想的语言和时间之谜,人们不只是只有科学的、哲学的和神学的这几种运思与化解方式。还有一种比它们的历史更悠久、但至今仍未得到很好沉思的方式,那就是:文学。文学以其与语言自身的天生的自反关涉性关系和与时间一同涌现又相互纠缠的本体化关联的先天优势,自它一诞生起,就以一种非对象化的、自我发生-展示自身的方式,异常奇妙地生发-

展示了语言和时间本身。只可惜,由于与西方形而上学分享了同样的预设前提与思维方式,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传统的西方诗学一直未能很好地洞穿文学的这一“秘密”。

传统的西方哲学和诗学大多遗忘了语言和时间,从而遮蔽了文学。随着现代西方思想的“语言学转向”和“存在论转向”,语言和时间问题才重新成为现代西方诗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西方诗学理论家都对语言和时间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不同层面获得了不少新知。这些“新知”在“耶鲁学派”(Yale School)文论家那里“汇聚”了起来,从而使“耶鲁学派”的文论家们对语言 and 时间的复杂交织的领悟,抵达了某种原初境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

概言之,作为一个“学派”,耶鲁文论家们之所以对语言和时间问题作出了某种原创性的沉思,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时间哲学转向”的背景下,凭着自身对文学语言和文学时间的错综复杂性的独特敏感,打破了西方文论和西方哲学单维度的思维定势,和对“永恒性”的虚幻诉求,对语言的多维度和时间的多向度的本体属性及其错综交织所触发的原初境域作出了全方位的直观和领会。可惜的是,由于受某种既定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以致学界至今对此尚未有较清晰的认识。由是,为了更好地谈论“耶鲁学派”对语言 and 时间的复杂交织问题的独到裁决,并澄清学界的误解,有必要重新对“耶鲁学派”文论的生成历程作一简要的勾勒。^⑨

如所周知,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耶鲁大学的四位文论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年-1983年)、约瑟夫·希利斯·米勒(Joseph Hillis Miller, 1928年-)、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 1929年-)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年-)以某种“集体”的姿态异军突起于美国文论界。由于他们的“激进”姿态,又由于他们与德里达的紧密关联,以致有学者径直将他们视为是一个“解构主义”的文论“流派”。受这一既定认知的影响,学界对“耶鲁学派”文论的考察,便形成了一种尖锐的对立状态:一方面,有学者因“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主张而热情响应;另一方面,有学者则因他们与“解构主义”的关联而大加挞伐。稍后,有学者

认为耶鲁文论家并非全都认同“解构主义”的主张,并非全都具有“解构”的特征,因而争论他们不能称为一个“学派”。而更多的学者则干脆回避这一问题,只分别对他们作个案式的考察。凡此种种,由于大多以某种未加反思的“解构主义”认知为立论的前提,从而导致了“耶鲁学派”的整体误读或误解。

表面上看,事情确如论者所说的那样,耶鲁文论家们既没有共同的思想渊源,又没有共同的理论主张,因而根本不能称为一个“学派”。然而,倘若我们从“理论总是具有某种统一性和同质性”这样的研究预设和对象化的研究方式中超越出来,以一种“生成性”的眼光来考察耶鲁文论家的所思所感,那么,我们将不难发现他们的“互文性”之所在。这一“互文性”即:在反叛传统的文学观念的形而上学预设的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思想资源,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文学”存在的“双重属性”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阐发。

如所周知,西方传统的文学观念的形而上学预设主要有二:一是每一个文学文本都是一个有着自身生命的有机统一体;二是每一个文学文本都是一个有着开头、中间、结尾的线性系列。这两个预设都导向一个更隐蔽的形而上学假定:即每一个文学文本(广义言之,全部的文学作品)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原初本原或终极依据。文学批评的任务和目的,就是揭示这一原初本原或终极依据。这一形而上学预设支配了西方两千多年的文论史。可是,在耶鲁文论家看来,这一同质性文学观对文学的“双重性”“实事”构成了全面的遮蔽。

耶鲁文论家们从如下一些角度揭示了“文学”的双重属性:

就文学批评而言,德·曼从批评总是盲视与洞见并存(批评总是自我抵制)这一角度,米勒从不存在绝对外在的批评、批评总是与作品相交织这一角度,布鲁姆从阅读即误读这一角度,哈特曼从批评总是兼具理论性和文学性这一角度,分别揭示了文学“批评”的双重属性,从而颠覆了批评总是依附、从属、寄生于作品的假定;

就文学书写而言,德·曼从写作总是一种双重模仿(对现实的模仿,对模仿的模仿)这一角度,布鲁姆从文学创作总是通过摆脱前辈诗人对自己所产生的影响的焦虑而获得原创性这一角度,米勒从文学创作总是重复写作(所有伟大的

作家毕生都只写一部作品)这一角度,哈特曼从创作总是自然与想象的对立统一这一角度,同时论证了文学“书写”的双重属性;

就文学文本而言,德·曼从“文本即寓言”(文本总是对它所不是的东西的指代)这一角度,米勒从作品总是包含了自我阐释(多重叙事)的因素这一角度,布鲁姆从文本总是某种反映性的镜子和修辞性的迷宫的结合体这一角度,哈特曼从《圣经》阐释文本乃是由原典与阐释、一代又一代的阐释和一代又一代对阐释的阐释的文本叠加而成这一角度,默契地阐发了文学“文本”的双重属性(错综交织)。

耶鲁文论家们的上述发现,无不适用于文学史。换言之,文学史也具有一种双重性的生成机制:文学史并非一既成的历史事实,文学史总是有待生成。

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耶鲁文论家们不仅自觉地贯彻了一种双重性的批评策略,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发现了文学双重性的生成性基底:如果说批评的双重性来自于文学文本,那么,文学文本的双重性则来自于语言本身。

本来,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耶鲁学派”文论家们独特的语言观对于他们的文论思想的生成的至关重要性(对于下文要讨论到的时间观,也如是)。然而,在某种现成的研究范式的制约下,绝大多数学者只是指出了这一“事实”而已,而未能在这—“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是语言本身决定了文学文本内在的双重属性,这是为什么呢?在耶鲁学派文论家眼中,“语言”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本性?与其他文论家和哲学家相较,耶鲁学派的“语言”观又有何特色?他们彼此之间又形成了什么样的“互文性”?

如果我们超越了“文学理论”这一现成“学科”为我们预先划定的边界范围,同时不再将文论史研究等同于某种现成的理论观念的总结,而是将耶鲁学派的语言诗学放到整个西方(现代)思想史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分析,那么,我们将不难发现它们的如下原创性及生成秘密:

尽管在“语言学转向”之后,英美分析哲学和德法思辨哲学均确认了语言的本体地位,但是,二者的运思道路却有着天壤之别。概言之,英美分析哲学大多依赖于经验主义的实证逻辑,将语言当成一种既成的事实或规则来分析。而德法思辨

哲学则因总是要探讨语言的形而上学的本原/非本原,或言说的先天可能性,从而触发了对语言的生成之思,进而引发了一种生成逻辑。在吸纳、融通两大传统的过程中,从文学批评的“实事”本身或内在要求出发,耶鲁文论家们将(文学)语言的全部丰富复杂性列为自身的考察对象,从而一举超越了英美分析哲学总是以句子为出发点去分析特定的语言现象的狭隘视野,获得了对语言本体的某种更整全、更本源的知。另一方面,由于对(从文本细节到局部文本到整个文本再到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修辞现象的纤毫毕现般的敏感,使耶鲁文论家们摆脱了德法思辨哲学偏好作整体性的形而上学思辨的习惯,从而实现了对(文学)语言本体的内在构成的“实证”分析。

概括地讲,耶鲁文论家在考察语言与人间万象、语言与(操各种语言的)言说者、语言与语言(文本内部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发现它们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却又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敏锐地直观到了语言的三个维度:所指性维度、语言间性维度和自反关涉维度,并进一步揭示了其转换生成的秘密。

不仅如此,由于语言与时间的须臾不可分离,耶鲁学派对语言本体的思考,还触及到了它的时间基底。通过对文学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时间流逝现象、重复现象和时空错乱现象的精微阐发,耶鲁学派文论家不仅揭示了时间本体的三个向度或层次:活生生的现时、分裂的绵延和自反的共在,而且还揭示了它的时代错置的交互发生机制。

从总体上讲,“耶鲁学派”文论对“语言三维”和“时间三矢”的发现,究竟有什么原创性和超越性呢?客观地讲,西方思想史并非对“语言三维”毫无认识。比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就是建立在语言的能指-所指——对应这一单维度的直观之上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奥斯汀特别地彰显了“以言行事”即语言的主体间性之维(结构主义文论家将之发展成“语言间性”之维);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则以某种“极端”的姿态,敞现了语言的自反关涉性。毫无疑问,这些思想都给了耶鲁学派文论家极大的启迪。但是,与以往的思想家总是倾向于彰显语言的某一个维度而拒斥另外两个维度不同,耶鲁文论家们则将它们异常出色地整合在了一起:

保罗·德·曼通过对语言的语法含义和修辞

含义的张力关系的分梳揭示了语言三维的奇特交织——传统的语法学是建立在语言的所指性和约定俗成性之上的,而一种本体化的修辞规则不但彰显了语言的自反关涉之维,而且认为这一自反关涉之维为另外两维提供了基底;

布鲁姆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误读”机制的分析完全以对语言三维的直观为前提——“影响”之得以可能表明言说总是具有某种稳定的所指,“误读”之所以可能表明言说总是有斩断自身之所指的潜能,先前文本和后来文本的“影响-误读”机制标明了某种“文本间性”的存在,而“影响-误读”机制之得以确认则标明了言说总是具有“主体间性”之维;

米勒的语言之思则融汇了现象学批评的“主体间性”、结构主义文论的“文本间性”、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德里达的文字学思想和后来更时髦的媒介诗学——所有这些理论都特别地彰显了语言的某一维度;

哈特曼“所有语言都具有一种内在的不透明性、中介性或调节性”这一理论主张本身就表明了他既不黏滞于语言的任一维度又对之全都有所肯定的自觉。

耶鲁学派语言观念的独特性与其时间观念的原创性相对应。如所周知,早期海德格尔困扰于如何将时间性的此在之向死而生的分裂结构植入超越性的时间-存在即永恒之中。海氏的这一失败给德里达留下了超越的余地。通过对“最终是为了学会生活”这一生存事实的时间本体的奇警分析,德里达在时间性的分裂结构中发现了“他者”——绝对的“他者”(维度),从而化解了海德格尔所谓的时间性——时间的悖论,并揭示了时间内部的差异错置性。然而,由于无法找到这一时间的差异错置性与从海德格尔的语言之道说的原始区分中还原出来的异延逻辑的结合点,德里达最终未能揭示语言与时间的复杂交织。

德里达的失误为耶鲁学派留下了超越的可能。在对多重叙事的时空交错现象的精湛分析中,在对互文性文本的时空重叠现象的精微揭示中,在对开端和结局的追溯之不可能性的精彩思辨中,耶鲁文论家们不仅彻底解构了时间之“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预设,同时又为各种时间观念的合法性留够了余地。

深入分析耶鲁文论家们的语言-时间诗学,可

以发现,尽管其表现形态不同,深度不一,但他们都一以贯之地分享了某些共同问题意识。其中最核心者,就是从批评或解读的不可能性,追溯到言说本身的不可能性与起源和结局的追溯的不可能,从而导向对“可说-不可说”、“永恒-非永恒”这一原初(终极)悖论的文学性沉思。

具体而言,尽管耶鲁文论家们认可“语言的修辞性或踪迹性使言说不再具有一个终极所指”这样的说法,但同时,耶鲁文论家们也发现,正是因为语言(文学)所客观存在的修辞效应,才将人们带入到了一个触发“可说-不可说”之终极悖论的原初境域。由是,耶鲁学派便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化解了“言说之不可能性”的难题。

而对时间的“时空错置交互生发”机制的揭示,则使耶鲁文论家们超越了海德格尔“原始的分裂”说的“存在-神学-逻辑学”的形而上学视野和德里达“差异的踪迹”观的“虚无主义”嫌疑,让自己驻留在了由文学时间所敞开的某个存在的共同境域。

总之,鉴于耶鲁学派的全部批评实践和理论反思都是建立在对语言和时间“生成性”机制之思的基础上的,因此,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讲,我们便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耶鲁学派文论开创了一种“生成诗学”(其实,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何尝不是一种生成哲学呢)。

必须指出的是,耶鲁学派的上述思想还是批评性的(或反思性的),带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特征,还不完全具备理论的“体系性”。不过,考虑到耶鲁学派文论的核心宗旨之一,就是后辈诗人或文论家(如要获得自己的原创性),(就必须)以强力的方式对抗前辈诗人或文论家的“影响的焦虑”,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从耶鲁学派文论家的“互文性”中,修正性地读出(或重构出)上述“体系”。

四、重申诗与哲学之争

语言破碎处,世界一无所存。当后现代思想家通过揭露哲学的文学性以宣称文学超越哲学之时,表面上,他们终于为长达两千多年的诗与哲学之争作出了终审裁决,诗人们赢得了合法性;但谁曾想到,后现代思想家碎片化的语言观却反过来使他们自身失去了一切。

幸而 耶鲁学派文论家对语言三维和时间三矢的发现 使语言得以重新聚集。由是 一个自然会引发的追问就是: 当语言重新聚集起自身的时候 按海德格尔的说法 诸神、万物、大地、天空、他者和自我是否必将响应语言的召唤 于隐匿中重新显形呢?

答案是肯定的。首先 有鉴于语言与世界的本体同构性(世界本身也是一种本体化的语言) 当语言被揭示出具有多个维度时 也就等于揭示了世界的多维性和多层性。与此同时 由于文学世界与存在境域的本体同构性 因此 当文学世界被揭示为一种差异错置的话语体系时 人类生存的存在境域也就被揭示为一种差异错置的存在体系。

其次 考虑到人类历史在本体上的书写性 因此 当揭示了文学书写、文学史的层垒地叠加的、时代错置的生成机制时 很显然 人们也就揭示了人类历史叙事的层垒地叠加的、时代错置的生成机制。

第三 揭示了存在境域的差异错置性 也就打破了那种同质化的、单维度的世界视野预设。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层垒地叠加的、时代错置的生成机制 也就打破了那种单向度的、线性发展的历史假定。而打破了同质化的、单维度的世界视野预设和线性发展的历史假定 也就打破了以往那种社会整合机制与个体精神救赎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 从而为重建人类社会的文化整合与精神救赎机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总之 语言三维和时间三矢的发现 为我们应对、超越当今这个“碎片化的世界、碎片化的历史、和碎片化的心灵”提供了某种新的可能。而从文学书写和批评的角度看 所有这一切都必然要汇聚于新的表意范式的探寻和实践。明白了这一点 倒过来也就明白了耶鲁学派之所以标举批评的文学性和双重性的深义: 通过表意范式的转型开辟出世界体系和存在意义的范式转型。

耶鲁学派文论真正揭示了文学超越于哲学的秘密。这一秘密即: 文学的语言-时间本体远非传统诗学和哲学的语言学-时间哲学预设所能涵括。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 不妨简要比较一下传统的语言-时间观与耶鲁学派的语言-时间观的差别。

利奥塔在提到科学知识的语用学和叙述知识的语用学的对比时曾说:

1. 科学知识只专注于一种语言游戏 即指示性陈述 而排斥其它的游戏。

2. 科学知识就这样与其它那些组合起来构成社会关系的语言游戏相分离。

3. 在研究领域 科学知识只涉及陈述者的位置 对听话者的能力和指谓的能力没有任何特殊要求。

4. (除非被证实和可讲授) 科学陈述不能从它被讲述这个事实本身获得任何有效性。

5. 因此 科学游戏意味着历时性。这种历时性以储存记忆和追求创新为前提 它显示的基本上是一种积累过程。(利奥塔 54-56)

仿照利奥塔 我们说:

1. 传统哲学、诗学只承认一种语言游戏 即语词-实在一一对应的指称性游戏 而尽可能否认其它的游戏。

2. 传统哲学、诗学就这样与语法、逻辑(或理性)结合在一起 获得了它自身的自主性和自律性。

3. 这种自身封闭的话语体系总是会指向一个整全的主体、绝对的精神或生命 而不是引发一系列生生不息的问题或问题谱系。

4. 这样 传统哲学、诗学就获得了它单向度的普遍性 从而为自身提供了合法性。

5. 最终 传统哲学、诗学实现了它所追求的永恒性和非历史性。

然而 耶鲁学派文论彻底地修正了这一切。因而 耶鲁学派文论就在一个更本源的层面上重新激发、反思了诗与哲学之争。

海德格尔反复强调思与诗的比邻而居。他说 在“与所有单纯科学思维对立的精神的本质优越性”的意义上 亦即 在可以言说“无”的意义上 “只有诗享有与哲学和哲学运思同等的地位”(海德格尔 26)。“在诗人的赋诗与思想家的运思中 总是留有广大的世界空间 在这里 每一事物: 一棵树, 一所房屋, 一座山, 一声鸟鸣都显现出千姿百态 不同凡响”(海德格尔 27)。

耶鲁学派文论显然否定了这种让诗自身道说自身的思路 从而将文学的终极目的揭示为:

挑战“不可说”的极限边界,为“可说”拓展出无穷无尽的新的可能。在这种从万丈深渊的悬崖边上纵身一跃而又永远也不会触及渊底的极致般的冒险中,在这种带着沉重的镣铐自由舞蹈的生命律动中,在这种义无反顾地踏过荆棘采摘带血的花朵的献祭仪式中,打破日常生活时间的单维度囚禁,绵延、持续、流畅地体验那从未体验过的时间的多维度的分裂结构,进而领会到那空明澄澈的万事万物此刻当下的共在情景。

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学”,已经远不止是当今学科意义的狭义的文学。柏拉图、奥古斯丁、老子、庄子……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的哲学和神学著作以及所有的宗教经典之所以伟大,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当它们用哲学和神学的方式来裁决人类思想的首要问题而遭遇到有效性的极限边界时,极为智慧地诉诸了这广义的文学。

不过,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各有所胜,诗与思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在这样一个意义上,重提诗与哲学之争,其根本目的就不是为了强调文学对哲学的超越,或哲学对文学的超越,而是为了指出西方思想的必然命运:朝着世界体系和人类精神的整合机制的当代性(全球性)重构的范式转型!从这样一个角度讲,对耶鲁学派的“语言-时间”诗学的研究,也就有了介入当代西方学术的预流的可能性。

然而,对于早就对西方诗学产生了影响的焦虑的当代中国学界来讲,究竟该如何介入这一预流呢?

英国作家王尔德曾辛辣地讽刺说,“一个人若要具有地道的中古遗风就应当没有肉体。一个人若要具有地道的现代风韵就应当没有灵魂。一个人若要具有地道的古希腊味就应当没有衣服”(王尔德 282)。因此,不管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如何着手自身的范式转型,首要的任务,就是克服在吸纳西方文论时的偏狭性、片面性和同质性。

注释 [Notes]

①事实上,由于我在这里所“摹仿”的,仅只是海德格尔的中文译本,因此,它至多算得上是“摹仿”的“摹仿”、“双重摹仿”,与海德格尔的原著隔了“三层”。

②详细论述请参拙著《解构的难题:德里达再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四章“解构与原初视域”,第 108-52 页。

③早期海德格尔的“时间-存在”之思,按学界通行的说法,其困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此在与世界-存在的原初统一”来化解“主体与世界的分裂”的努力,本来是想超越“唯我论”的独断论,却有陷入更彻底的唯我论的危险;二是很难将时间性的此在之向死而生的分裂结构植入超越性的时间-存在(即永恒)本身之中。

④海德格尔在《时间概念史导论》(1925 年)中对“意向性”的如下规定:意向性即“意识行为与意向对象的相互共属”,以及“意向行为即自身-指向行为”这一定义(参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57 页),为此处的论断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

⑤早期海德格尔所保留的一系列本真/非本真、寻常的事物/超乎寻常的事物的二元对立,后期海德格尔“存在-神-逻辑学”一体化式的“道说”方式,从根本上来讲,都是这一“致命一跃”的表征。

⑥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与形成相分离且对立、存在与表象相区分又统一(同一)、存在作为思的“对象”与思(逻各斯、言说)既相区分又原始相属、存在与应当既相区别又相关涉。存在就是在这四个方面的原初开端中的原始的区分、原始的争执。因此,所谓对存在的遗忘,就是遗忘了这些原始的区分。

⑦由于西方后现代哲学家对不确定的张扬陷入了一种新的二元对立,因此,即使是最激进的西方后现代哲学,似乎也未有效地超越这一边界。

⑧这么说并不是否定古典中国思想同样存在着西方哲学那种“贬斥文字、祛除时间”的传统形而上学。思想史的复杂性是任何单维度的总结所无法概括的。

⑨详细论证请参笔者的另一篇论文《耶鲁学派“生成诗学”研究:现状、思路与方法》(待刊)。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

[Heidegger.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ans. Xiong Wei & Wang Qingji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

[Lyotard, Jean-François.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Che Jinsh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奥·王尔德“给受教育过多者的箴言(外一篇)”,多多译,《世界文学》3(1998):280-84。

[Wilde, Oscar. “Motto for Education Too Much.” Trans. Duo Duo. *World Literature*, 3(1998):280-84.]

(责任编辑:王嘉军)